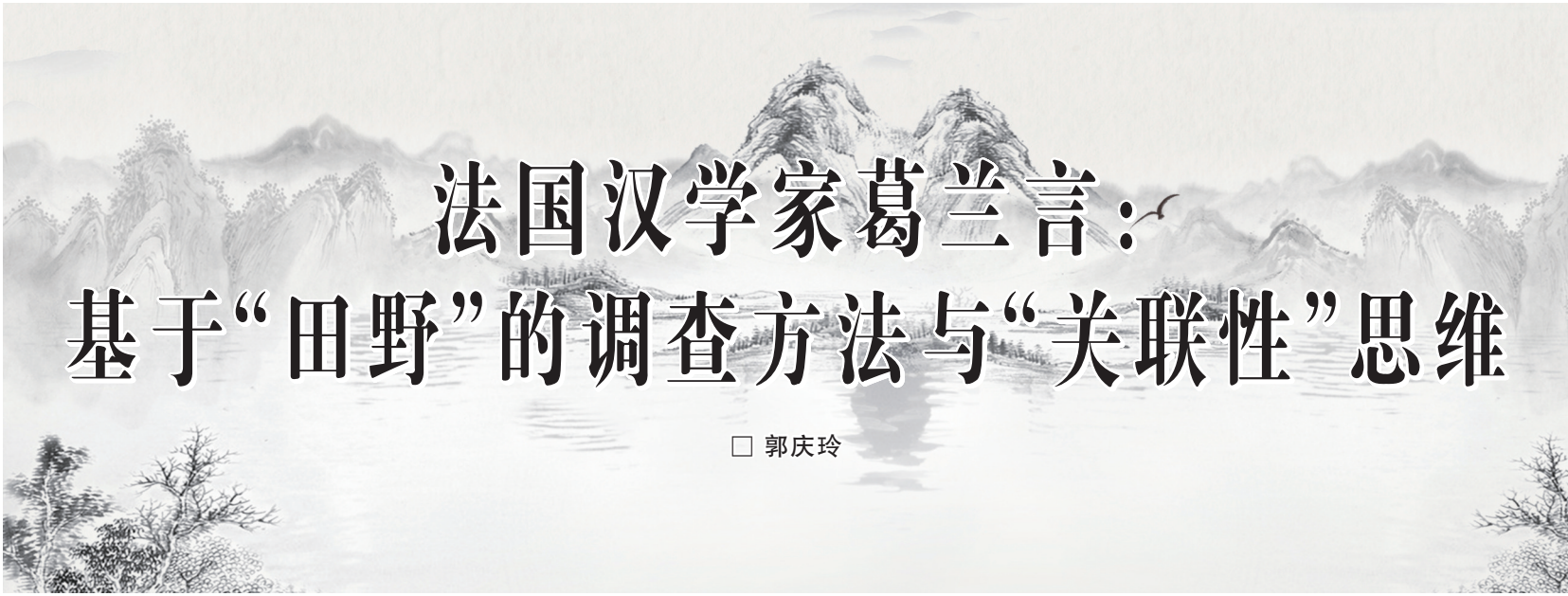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 基于“田野”的调查方法与“关联性”思维

□ 郭庆玲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是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他最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古代中国，最早提出“关联性”思维来概括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20世纪初，葛兰言在继承当时法国汉学界尤其是爱德华·沙畹对中国上古史、原始宗教等先秦文献研究、糅合法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以沙畹为主的当时汉学界的超越和突破，这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新材料，为中国古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以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作出深刻的探索和系统的阐释。

对汉学研究的超越和突破

葛兰言于1884年2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德拉姆省，于190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开启大学生涯。这一期间，他师从迪尔凯姆，并受莫斯影响，积淀了深厚的历史视野和治学方法。毕业后，葛兰言获得狄爱尔基金会的资助，在1908—1910年期间，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泰斗爱德华·沙畹学习汉学。沙畹对葛兰言影响很大。在三年学习期间，沙畹从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全面影响葛兰言，尤其在文献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塑造了葛兰言的问题意识，这促使葛兰言将研究视域转向中国上古时期的山川河流、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而沙畹对先秦古籍文献的分析促使葛兰言融合文献研究法和他原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启整体性视野，即把天地、自然、宇宙、文明等置于一个客观又综合的系统。

在20世纪初，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中心，葛兰言所归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正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涉及不同文明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比。葛兰言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文明，他分别于1911—1913年和1918—1919年赴中国进行实地调研。第一次归国后，继其师为高等研究院东方宗教研究所所长，后转任

东方学院教授；第二次归国后，出版《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这结合社会学年鉴派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意在纠正当时以传统汉学语文学为主进行研究的缺陷，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皆有卓著贡献。

这一研究曾引发广泛讨论，甚至有人称他将中国特殊化，其实他的研究始终秉持着破除普遍和特殊之间对立的观点，这与他研究时所坚守的整体性视角有关，即使深入某一朝代、某一案例内部，葛兰言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中国文明特殊化，而是以特殊化的方法试图获得普遍性的结论。在当时，葛兰言探索中国文明时采取的普遍化视角、以“田野”方式处理文本的社会学方法、提出的“关联性”思维，对其他地域文明的研究皆有启发，也迎来了年鉴学派开展研究的巅峰时期。

创新研究方法

在葛兰言之前，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语文学，而葛兰言率先起来对此方法进行纠偏。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迪尔凯姆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因此，他倡导用社会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调研并撰写了《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中国文明》《中国人的思维》等，在西方汉学中开创了解新的研究派别。这与他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密不可分。

其一，葛兰言的“田野”方法。葛兰言在《中国文明》的前言中提出，“将注意力放在有决定意义的那些时刻上”，而不是既有的观念、系统的研究资料，这可以较好说明“田野”方法——既是对中国的实地调研，也是面对文本时的整体性觉察，如对《诗经·国风》进行人类学、神话学分析，在阅读过程中整体性地感受和体会其中的信仰、态度等。与此相对的是研究古代中国所采取的文献学和训诂学的方法，他批判并认为这

会割裂甚至遮蔽文本中的历史真相，而正是通过“田野”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得以从《诗经》中揭示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他认为神话是另一种“历史事实”，是人们当时意识形态和观念系统的基本反映，因而将神话、传说等都纳入研究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呈现，而后的陈寅恪亦受此研究方法的影响。

其二，多元又综合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葛兰言承袭自沙畹的“语文学派的专长”之基础上掌握的“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亦即“最精确与最进步的历史学的方法”。“语文学派的专长”虽然不是葛兰言直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这是葛兰言整体性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对文献的“田野”式的研究方法，是以来自“语文学派的专长”所积淀的“内功”为基础。虽受沙畹影响，但总体上葛兰言采取的是社会学的方法。若过分注意葛兰言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对其研究方法的全面理解。所以，另一些学者格外强调葛兰言所采用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葛兰言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研究中，从最初对周代體制、古代神话、古代节庆、音乐、舞蹈等研究到后来对中国思维的研究，语文学始终是其主要分析方法之一。

葛兰言形成了多元的研究方法，这对当时中国学界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研究者以考据为主的方法、对当时汉学界以语文学为专长的方法而言是一种巨大创新，引发了中外学界的广泛讨论，且对当时以及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的相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提出“关联性”思维

一般认为，葛兰言是最早提出“关联性”以界定中国人思维特征的汉学家。葛兰言从古代史和文化史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早期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他从农耕生活的季节变迁、社会生活、祭祀仪式中引伸出祭祀的社会意义，进而提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是农业季节性

庆典的社会衍生物。而其中应用的思维正是“关联性”思维，而后，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他明确切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宇宙论研究，提出“关联性”思维。

他认为，“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中国人的常用思维是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存在，即对世界的看法是整体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更倾向于和合，而非分离。“关联性”思维主要是以阴阳分类理解世界、为世界确立秩序。基于阴阳，世界万物可以相互关联，并被先秦思想家凝练为一套思想系统。类比是“关联性”思维的基本特征。他强调并注意研究中类比的方法，“社会、人类、世界，是一门综合性学问的研究对象，要建构这门学问只能运用类比的方法”。基于此，葛兰言注意到所有时空都可纳入阴阳范畴并形成统一整体；祭祀仪式与宇宙、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促使宇宙、仪式、政治等成为一个整体；他对“关联性”思维及其内在逻辑运行的把握相当精准，将对“关联性”思维贯通宇宙、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有独到体会。

葛兰言明确否定“关联性”思维的迷信属性，呈现其科学性，他甚至将“逻辑—关联”作为中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差异点。这开启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关联性”思维的认识，尤其对紧随其后的葛瑞汉、李约瑟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开启中西比较研究以及90年代的“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等都有重要意义。

在追问中国文明的特征时，葛兰言综合了涂尔干、莫斯与沙畹的智慧，创新并实践了一种新的方法，寻找中国文明最初的起源，并且据此对历史的演绎进行解释。由于葛兰言对古代中国研究的贡献较大，他分别于1920年、1926年获得“儒道奖”。



海外汉学家

打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两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芒果树。这是1967年7月，时任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王后莫尼克向中国驻柬大使馆赠送的礼物。“根深叶茂绿意浓”，50多年来，两棵芒果树历经风雨，茁壮成长。它们见证了西哈努克太皇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中柬友谊，见证了中柬两国间一个又一个互利共赢的故事。

（一）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生于柬埔寨金边，是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王后之子，早年曾求学于越南西贡和法国巴黎。1941年，19岁的他登上王位。在随后的10多年里，西哈努克带领柬埔寨人民不懈奋斗，战胜法国殖民统治，实现了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1952年4月，他与莫尼克结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以诚相待，视西哈努克为真朋友，进行深入接触和交流，逐渐消除了他对新中国的偏见、疑虑和误解，为中柬两国早日实现建交创造了条件。1956年2月，在中柬两国并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中方友好地邀请西哈努克访华。西哈努克访华期间，两国高层领导人多次进行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双方签署了对柬埔寨进行无偿经济援助协定，并就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共识。此访拉开了中柬两国正式交往的序幕，西哈努克夫妇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返回金边后不久，柬埔寨断绝了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用实际行动承认了新中国，给予新生的共和国巨大支持。

1958年7月，中柬两国正式建交，开启双边合作新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哈努克夫妇曾先后6次踏访中国，用脚步感知真实的神州大地。他们亲眼见证了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的伟大成就。不论是中国人民身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豪气，还是铺展中华大地“无边光景一时新”的繁忙景象，都让他们发自内心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敬佩之情。“只有在患难中，才能识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此时，西哈努克已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准备到北京参访。毛泽东知悉后，作出决策表示，西哈努克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认同别人。让他切身感受到“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友谊。旅居中国期间，每逢年节，中国领导人都都会宴请西哈努克夫妇并邀请他们参加庆祝活动。

（二）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西哈努克在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他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极力促成两国建交；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他多次为中国发声并紧密团结亚非拉国家，向他们传递中国爱好和平、真诚合作的愿望，以争取其对中国的支持；他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反对“藏独”“疆独”的分裂主义势力，坚定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002年，在柬埔寨第一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他主张有关国家同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推动在金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西哈努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肝胆相照、情同手足的“铁杆”情谊。

作为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每次出访他国或参加国际会议时，西哈努克总是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向外国政要及各界人士现身说法，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不以大国政党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力所能及帮助柬埔寨发展的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矢志奋斗的故事；讲清楚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故事……他用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交往的事实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西哈努克先后创作出《怀念中国》《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赞颂柬中友好的歌曲。1993年9月24日柬埔寨恢复君主制，西哈努克再一次成为柬埔寨国王，莫尼克改称莫尼列王后。2008年8月，西哈努克夫妇专程赴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2年10月，西哈努克因病在北京逝世。

（三）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向柬埔寨王室成员和政府高层人士明确表示，“两国高层和两国人民要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势头，真正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密切沟通交流”。过去十年，在中柬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两国在政治、产能、农业、能源、安全、人文等六大领域密切加强合作。从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柬埔寨，到2020年2月，柬埔寨首相洪森访华，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从考斯玛中柬友谊医院、柬埔寨国家体育场等援柬项目的启用，到紧锣密鼓地建设暹粒新机场、桔井湄公河大桥等交通设施，促进互联互通；从优质的大米、香蕉等农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认可到提高粮食安全，着力构建柬埔寨立体多元、复合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两国合作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勾勒出一个个暖心故事和友好佳话，汇聚成一首首心心相印的时代乐章，成为新时期国与国平等相待、真诚合作的典范。

2020年11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颁授“友谊勋章”。他表示，莫尼列太后是中柬友好的重要见证者和推动者。这枚沉甸甸的“友谊勋章”，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莫尼列太后的崇敬之情和对柬埔寨人民的深厚情谊，也象征着中柬两国亲密无间的友好感情。仪式上，莫尼列致答谢辞表示，柬埔寨人民将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祝愿柬中友谊万古长青。



成事在先——三国刘馥的先手棋

□ 崔 庆

饱带饥粮，晴带雨伞，老百姓过日子都讲究“留一手”，军国大事更要有风险意识，三国时代的刘馥就是这样的“识途老马”。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人，目光敏锐，善观大势，行动果决。建安初年（196年），刘馥看清袁术无能昏暗，便劝说袁术部将，一同率领人马投奔曹操，并受到赏识，成为其幕府谋士。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和袁绍正在官渡对峙，处于胶着状态。北方大事未定，南方局势已乱，孙策所部袁耗，扬州刺史严象毁于乱军之中，长江中下游以南、以东的扬州辖境，大多被孙策孙权占有，地方豪强并起。如果角逐天下，曹操必然要和孙氏势力争夺江淮地区，经略合肥、重新建置扬州是关键一步。情势危急之下尤需开局破局，曹操认为刘馥“可任以东南之事”，任命其为扬州刺史，期望能够迅速稳定后方。

刘馥本为一介文臣，临危受命却豪气满怀、浑身是胆，只身匹马进入扬州的合肥城，迅速开

出了应对“药方”。一是建立州治。落实曹操的战略设想，以合肥为中心，重新建置扬州，建设抗衡孙氏势力的前线基地，用怀柔方式化解雷绪等人的地方叛乱，迅速稳定了江淮地带的局势。二是安顿百姓。百姓乐附，远人来归，“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劳动得到了极大补充，改变了原先合肥“空城”的窘境。既来之，能安之，刘馥还兴办教育、推广屯田，“数年中心恩化大行”，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三是兴修水利。古时水利为国计民生之本，刘馥组织修建、整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设施，疏筑并举、方便灌溉，百姓受惠，同时奖励农业开垦和耕种，促进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四是整军备战。刘馥就任扬州同年，孙策遇袭身亡，这对于曹操阵营看似是重大利好，但刘馥丝毫没有松懈，深刻认识合肥城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利用一切条件加紧备战，全面做好与孙氏势力硬碰硬的准备。

北方战局吃紧，刘馥单身空

手入合肥，不可能指望有任何后援，只能就地挖潜、自力更生。人气聚拢了，就会有办法。合肥地处南北要冲，在当时乱世之中，决不能有任何侥幸，自强才能自卫，必须要有打大战、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基础，加固城防尤为重要。史称刘馥“高为城垒”，意在把合肥打造成前线坚城，适合在己方弱势的情况下打持久防御战。此外，刘馥储备大量木石、草苫、鱼骨，以为“三宝”，作为战略物资。木石可以做成滚木礮石，是传统的防守武器；草苫可以挡雨、铺路，应付天气突变；鱼骨易于储存，经久不变，可以照明、燃灯，情急时候也可以充饥。这三样物品的制作原料普通，木石取自山林，草料来自荒野，水乡盛产鱼虾，鱼骨的价格远低于灯油，但用途更加广泛。几乎不需要额外经费，合肥城的备战物资就充盈府库了，达到“草苫数千枚”“鱼骨数千斛”，有了抗击大敌来袭的底气。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就在同

年，曹魏主力深陷赤壁前线，孙权亲自领军围攻合肥，试图乘势一鼓而下。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合肥经过刘馥近十年经营治理，已经脱胎换骨。孤城虽危，但人心安定、从容应对，草苫雨中护城，鱼骨夜中照明，滚木礮石防御，百日苦战安然无事。此后孙权数次攻伐合肥，都是无功而返。尤其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第二次领主力大军前来，却被张辽以少胜多，甚至几乎命丧道途。合肥固若金汤，扬州民众更加敬佩刘馥先见之明，认为其功绩甚至胜过春秋时代修建晋阳城、救赵氏于灾难的董安于。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能者深得其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治理、十年备战，刘馥从“救火队长”到善治良牧，走一看三观五，综合治理和聚焦备战长短结合，合肥成为遏制孙氏势力北上的关键棋子。刘馥从未和孙权交手，却成其噩梦，扬州官民长久感念他的功德，他所组织修建的陂塘水利一直也为后世沿用。